

我在韓國傳教史中，認識了一個新朋友，有心靈的交匯，也介紹給你一齊為今年劃上句號，並共闖新的一年。

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玉成得教授在《韓國教會史的重寫》一書裡，給他正名為第一位在韓國事奉的監理會(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)傳教士。這是慶祝韓國教會史一百三十年時，該國第二大宗派的監理宗作出的修正。他在耶魯大學(神學院)和哥倫比亞(醫學院)畢業，1885年2月27日與母親、妻子和兩歲的女兒抵達日本，同年5月6日自己先到漢城(今首爾)開始醫療傳教，醫院的牌匾〈施醫院〉是國王高宗所賜。醫院位於貞洞，與王宮是步行只有五分鐘的距離。(貞洞是我長大的地方，小學時天天路過)。稍作安頓後，母親與妻女也來到朝鮮。

他在施醫院不久，離開外交官、傳教士和西式學堂聚集的貞洞區域，走到南大門邊的貧困區繼續醫療傳道，並建立了尚洞教會(1888年)。後來，他又到更遠的亂葬崗(多埋葬重病患者)附近開設西藥所，建立了現今鼎鼎大名的阿峴監理教會。但是，一直以來因為亞篇薛羅(Horace G Appenzeller)辦校的光環，人們在記憶中只認識長老會的元杜尤和監理會的亞篇薛羅，是開創韓國教會史的先鋒。那麼，問題是：「他為何被遺忘？」

1905年韓國政府名存實亡之際，尚洞教會的青年們舉行了連串抗日聚會，被常駐日本負責亞洲事工的傳教士米里曼·哈里斯(Merriman R Harris)指責，使他與這位親日派傳教士產生矛盾。他是韓國傳教區代表，哈里斯是遠東地區的上司，此時亞篇薛羅已經殉道。他在韓國，目睹日本政府的種種壓迫行徑，支持教會的愛國活動。最終矛盾白熱化而他辭去宣教士職務，離開了美北監理會；也辭掉了牧師職務，單獨一人行醫，曾一度到大連工作，最後消失在日本。

韓國在新近製作的記錄片中，製作隊伍走訪美國德魯(Drew)大學檔案館查他當年的書信；到英國尋找他的第四代後孫；到日本尋找他的遺蹟。韓國史學學者認為，不應該因為辭職失去差會記錄，便消失在教會的記憶之中；何況他是因為支持朝鮮民族的抗日而離開工場，箇中痛苦無人能知。接受電視訪問的旅日韓國基督徒學者說，終於在日本神戶的外國人墓地找到了一個墳墓，墓碑有一個名字：William Scranton, (1856-1922年)，那一刻幾乎落淚。他的韓國名字是「施蘭敦」。從施蘭敦辭職的1907年至1922年的生活，被稱為「孤獨的歲月」；然而，他的辭退反而贏得了韓國教會無比的尊敬，因為他站在被壓迫的一邊，選擇失去最崇高的宣教士職份，成為一個被遺忘的傳教士。活出了他的骨氣！

2008年韓國教會成立了〈施蘭敦紀念事業會〉，今天我們才聽到這樣的故事。